

Study on the Civilian Channels During the Process of Normalization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1980-1991)

Juan Huang

Nanning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2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1980s to the early 1990s, when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had not yet fully thawed, civilian exchang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normalizing bilateral ties. Border trade evolved from spontaneous material exchanges to standardized mutual market systems,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livelihood needs for border communities. Sports exchanges strengthened emotional bonds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Inform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provided platforms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These civilian networks, intertwined with official diplomacy, collectively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in 1991 and set a classic example for thawing relations among socialist states during the late Cold War period.

Keywords

normalization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people-to-people channels; border trade; sports exchanges; second-track diplomacy

中越关系走向正常化时的民间通道研究(1980—1991年)

黄娟

南宁学院, 中国·广西南宁 530200

摘要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中越官方关系尚未完全解冻的背景下,民间往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重要助力。边境贸易从自发性物资交换到规范化的互市体系,有效缓解了边民生计需求。体育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结。非官方渠道的沟通交流,为双方提供了信息传递和立场试探的平台。这些民间通道相互交织,与官方外交形成有效配合,共同为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冷战后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解冻提供了典型范例。

关键词

中越关系正常化;民间通道;边境贸易;体育交流;第二轨道外交

1 引言

上世纪80年代,中越关系处在冰冻期。然而,冰层之下暗流涌动,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并非凭空而来,在官方通道隔绝之时,是否存在一条“民间通道”在悄然融冰?其具体形态与历史作用为何?现有关于中越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且内容丰富,研究多集中于中越关系进程的梳理、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不同领域的互动往来,但对于80年代中越两国尚处在“冰冻期”的内容,尤其是“民间通道”在此期间的存在和作用发挥涉及较少,虽偶有提及,但未将其作为主线进行系统梳理。^{[1][2][3][4]} 本文将依据时间与逻辑顺序,从“边境贸易的恢复”“体育赛事的交流”“‘第二轨道外交’的助力”三个层面论证“民间通道”在中越关系走向正常化过程中的运行机制与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黄娟(1999-),女,中国广西玉林人,硕士,助教,从事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2 边境贸易的恢复:物质往来的先导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边境贸易的恢复与发展构成了一个基础性且持续发挥作用的民间通道。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越两国官方关系尚未解冻,但基于地理毗邻性与经济互补性,边境线两侧的民间贸易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悄然复苏,由零星、地下的“草皮街”发展为规模可观的边境互市体系。边境贸易的这一发展历程展现了民间力量在外交僵局中的突破作用,也为后来两国关系的正式正常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2.1.1 民间自发贸易阶段(1980-1983)

1980年代初期至1983年,中越边境贸易主要表现为民间自发的零星互市。1979年后,中越之间的官方贸易彻底中断,但边境两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巨大的需求差催生了冒险的贸易。因此,在中越两国边境地区,主要是广西段的边界线附近,由边民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的、在边界线上恢复互市交易,形成了被称为“草皮街”的民间贸易形式。中越双方边民默契地来到约定地点,铺上一块塑料布

或直接在草地上，摆上货物，通过手势比划、简单的计算进行讨价还价，“草皮街”由此而得名。这种贸易方式虽然原始，却充分体现了边境居民应对困境的生存智慧。越南边民带来鸡、鸭、猫、狗、兽皮等农产品，中方边民则提供布匹、电筒、药品、解放鞋、三花酒等工业产品。^[5]这种贸易模式虽然规模有限，但客观上缓解了边境居民的生存压力，也为后续正式边贸的恢复积累了社会动力。

2.1.2 地方政府引导阶段（1984-1987）

1984年至1988年，边境贸易进入地方政府引导下的有序发展阶段。随着边境地区形势的微妙变化，中越两地政府开始对民间贸易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1983年后，广西、云南等地根据实际情况，在边境中方一侧试点设立互市点，“非正式地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6]这一政策导向体现了当局的务实态度，也为边境贸易的规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根据相关研究，“在当前越南边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宜硬性堵塞越南边民来中国，与其让自发的黑市存在，不如因势利导，在边界中方一侧确定几个集市点，非正式地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6]。如，在1983年2月云南省批准金平县十里村集市点为允许越南边民入境交易的互市点，1983年9月广西大新县硕龙乡弄怀设立了对越南边贸易境点。到1985年，中越边境已有二十多处交易点。这些交易点规模不大，但效果很好，促进了边境地区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

2.1.3 快速规范化发展阶段（1988-1991）

1988年至1991年，边境贸易进入快速发展和规范化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自中越边境我方一侧先后开办“草皮街”交易点，并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后，1989年春节前，越方单方面开放对华口岸，大量边民携带商品进入中方东兴镇进行交易。^[7]这一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同年四月，中方宣布恢复对越正常贸易。这一系列措施推动着中越边境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9年6月，越方允许北部边境省份与中方开展小额贸易，以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5]从此，越方参与边境贸易的人数和商品数量显著增加。

中越边境贸易在1980-1991年间经历了从自发形成到有序发展、从零星交易到规模经营、从民间自发到官方认可的演进过程。这种边境贸易不仅满足了两国边民的物质需求，增进了民间层面的相互了解，也为后续两国关系正常化积累了必要的实践基础和社会共识。

2.2 体育赛事交流：情感联结的破冰

在国家关系处在对立，或还未建立起外交关系时，体育在国家关系中的特殊作用能够打破僵局，弥补两国沟通上的断层，传递友好信号。在中越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两国在体育上的接触就以其感染力和非政治性，成为重建两国信任的重要民间通道。

2.2.1 国际赛事中的互动与接触

中越因地缘关系，在历史上两国在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体育作为一种非政治性的活动，它是中越交流接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越友谊与相互理解、认同上发挥了独特作用。^[8]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11届亚运会于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这届亚运会。^[9]越南奥委会也派出了体育代表团参赛，这是自1979年以来越南代表团首次来华参加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在双方关系还未解冻之际，参加由“对手国家”主办的大型赛事，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越南代表团的到来，等同于越南官方对中国发出的一种公开的、默许的友好姿态。中方接待越南代表团，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2.2.2 区域性体育交流的开展

在亚运会之外，中越存在着更低调的双边体育接触。中越之间地缘相亲、山水相连，相似的地理环境容易形成特定的区域文化和族群文化认同心理，体育运动便是如此。这就使得广西、云南两地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之间的体育接触存在天然的便利。1991年，越南成立了国家武术队，并聘请广西武术教练进行指导。^[10]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越南的竞技水平，更建立了两国体育专业人士之间的直接联系。越南奥委会，特别是河内体育厅黄永江厅长将有关武术资料引进越南。^[11]此后，武术作为亚洲传统体育项目，成为连接中越两国文化的纽带，体现了体育交流在技术合作和人文互动方面的双重价值。纵观这一时期中越之间的体育交流，会发现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首先，这些活动大多采取相对低调的方式进行，避免过度政治化解读。其次，交流内容侧重于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体育项目，如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最后，这些交流往往通过区域性渠道开展，中国广西、云南等地与越南接壤地区成为体育交往的前沿。^[8]

体育交流虽然只是中越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它能最直接地激发民众的情感共鸣。当两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友好互动时，传递给他国民众的形象是“和平的竞争者”而非“战争的敌人”。这种情感上的软化，是政治谈判难以实现的，它为后来的正式和解营造了至关重要的民意氛围。

2.3 “第二轨道”外交：智慧沟通的助力

在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除了边境贸易与体育交流等民间往来，第二轨道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轨道外交”是美国外交家约瑟夫·蒙特维尔提出的概念，是指“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触和对话”，通常是学者、退休官员、智库研究人员等，以“私人身份”开展活动，核心目的是在官方渠道（第一轨道外交）受阻时，通过灵活、低调的方式沟通信息、建立信任、探索

解决方案,并为最终的高层政治接触铺平了道路。^[12]

2.3.1 1990年成都会晤的幕后通道

1990年成都会晤作为中越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关键突破,其最终达成有其历史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响力衰退,柬埔寨问题出现政治解决的可能,但当时越南外交部仍由亲苏的阮基石所掌控,使得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推进关系正常化存在阻力,因此,第二轨道外交展现出其独特价值。

1990年8月,越南社科院学者以私人身份向中国驻越南大使传递信息的事件,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契机。前驻越南大使李家忠表示,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他秘密向当时的驻越大使张维德传达当时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想绕过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直接同中方最高领导人直接会晤,商谈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两国正常关系的想法。^[13]这一事件是“第二轨道外交”的典例。第一,信使身份的非官方性。传递如此敏感信息的并非越南外交部官员,而是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能够有效降低风险。第二,沟通渠道的保密性,通过学术人员的私人接触,避免了正式外交渠道可能引发的关注和阻力。第三,目标的明确性,此举为之后正式的“第一轨道外交”开展,即两国外交部正式会谈,铺平道路,测试可能性。1990年9月,阮文灵与杜梅秘密访华,在成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双方达成“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共识,为1991年11月的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2.3.2 知识界的对话平台

在整个80年代,尽管中越官方关系处于冰封状态,但两国学术界,特别是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学者,始终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这些交流虽未直接涉及政治议题,却为双方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窗口。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两国学者在学术出版物上的合作。通过对《东南亚纵横》(原《印支研究》)等期刊的考察发现,在整个80年代,几乎每一期都有中越学者合作的文章或中国学者摘译越南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章涵盖范围广泛,包括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和经济研究。如关于历史文化研究的《〈大越史记全书〉的编纂过程和作者》,就是由越南学者潘辉黎著,中国学者曾广森节译;民族文化研究的《越南中部以北山区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信仰》,是由越南学者莫唐著,中国学者梁红奋译;经济研究的《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初越南对外贸易的兴衰》,则是由越南学者成世伟著,中国学者木岚译。这些学术文章虽然并未直接关涉到政治的议题,但维持了两国知识界的基本文化交流,避免了完

全的相互隔绝。待之后时机成熟之际,当两国政府决定推动关系正常化时,这些学术界的联系自然成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一种非官方渠道与官方决策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3 结语

1980—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民间通道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国家关系面临困难时,民间通道可以成为打破僵局、增进理解的重要补充力量。两国的商贸往来、体育交流、非官方渠道的接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根本上在于它们始终是在两国官方政策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的,与官方外交形成了良好的配合与互补。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国政府的政治决断和外交努力,但民间往来无疑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舆论环境。中越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民间通道作用的发挥,也为理解民间往来在国际关系中的辅助作用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黄兴球. 中越关系70年:基轴与方向 [J]. 南洋问题研究, 2020, (01): 31-40.
- [2] 张蕴岭. 新时代的中越相处之道 [J]. 世界知识, 2020, (20): 72.
- [3] 余浩铭, 吴昊. 推进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探析 [J]. 东南亚纵横, 2022, (06): 67-78.
- [4] 成汉平. 越共十三大、新领导层及中越关系未来走向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 (03): 112-124+4.
- [5] 谌礼强. 中越边境贸易研究[D]. 广西:广西大学,2003..p.12.
- [6] 陈光龙. 越南与中国广西边境贸易研究[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p.8.
- [7] 朱仁. 发展桂越边境贸易问题探讨[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17(1): 41.
- [8] 杨衍滔. 中越体育区域交流的当代困境与理论诉求 [J]. 体育科技, 2017, 38 (01): .p.45.
- [9] 中国宁波网. 第11届亚运会概况—1990年北京亚运会. (2010-10-13), <http://zt.cnnb.com.cn/system/2010/10/13/006706506.shtml>
- [10] 刘娟. 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体育交流现状及路径探析 [J]. 体育科技, 2024, 45 (04), p.57.
- [11] 裴春皇. 越南竞技武术散打发展现状的研究[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9.P.9.
- [12] 张昊. 国际政治中的“第二轨道外交”特点分析[J]. 才智, 2011(14): 212, p.212.
- [13] 李家忠. 中越领导人成都秘密会晤内幕——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前奏曲 [J]. 党史纵横, 2006, (01): p.23.